

“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宜定为6.8%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 王军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完成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编制的关键之年。在“十三五”规划所涉及的众多内容和目标当中,经济增长目标无疑最引人瞩目,特别是它的高低起伏将直接关系到党的十八大所确定的“两个翻一番”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离不开对于未来五年国内外大势的准确审视,以及基于此的对“十三五”时期的战略定位。

从国际来看,未来五年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大致可以进行这样粗线条的描绘: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期,世界经济平衡将出现一些新变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在艰难地加速转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势不可挡地加速发展,美国积极主导和推进的一系列区域性自由贸易谈判,包括TPP、TTIP、TISA等新自由贸易协定进展将加快,并且不排除其中一些已变为现实;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将从兴起到兴盛,全球科技创新不断迸发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重要动力的地位日益巩固,服务业稳居世界经济主导地位,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外需求复苏曲折而缓慢,全球性产能过剩既困扰发达经济体,也成为新兴经济体挥之不去的梦魇,此起彼伏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幽灵再次四处飘荡。

反观国内,经济“三期”叠加的错综复杂局面仍将延续,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愈加明显,进入到了不仅是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期,也是风险凸显期、升级机遇期和转型关键期的新阶段。笔者一直认为,“新常态”这一概念恐怕不是一个长远目标,也不是短期追求,而应当是一个中期目标。“新常态”逐步定型需要至少五到十年,“十三五”恰好处于这一阶段。为此,贯穿整个“十三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地位不断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也在逐渐增大。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仍将发生重大变化,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总体来看,尽管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但笔者仍然愿意乐观地判断,未来的国际经济环



境对我们还是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

基于上述分析,“十三五”时期将不仅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期,更将是全面进入“新常态”的转型期、全面实现创新驱动的突破期和全面推进国际化的上升期。

在这样一个战略定位之下,“十三五”时期应强调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把“提质增效”作为发展的主旋律,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力求做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和惠民生等多重目标的统一。为此,年均经济增长的预期性目标不宜定得太高,太高比如7%以上难以实现、难以承受;也不要降低太多,太低比如

6.5%以下则难以完成十八大确定的到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从一些代表性的机构和学者此前的研究和分析来看,普遍认为我国基本面因素仍可支撑6%-7%的经济增长,有些认为平均增速在6.5%左右,有的认为在7%左右。因此,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笔者建议,“十三五”时期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定为6.6%-7%这一区间,或者年均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定为6.8%左右。这样的发展速度既延续了我国经济中高速发展的步伐,同时又不至于降得太快,可做到“可进可退、可攻可守”。

需要强调的是,6.8%这一数值应当被看作是调控的“中线”,而非“底线”或“下限”。也就是说,未来宏观调控应坚持“中线思维,区间管理”的理念,完整的调控目标应当是一个区间。只要经济运行在目标区间内,没有触及“上限”和“下限”,就应保持政策稳定,保持战略定力,不应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强烈刺激和强紧缩政策。这样围绕中线进行调控,会给市场主体更加明确的预期,会使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更富弹性,使调控更加主动、灵活,上下都有回旋余地。更进一步,未来我们如果能以国际通行的较为客观、并且可以定期修正的预测性目标来代替当前较为主观且僵化的预期性目标,将是宏观调控的一大进步。

为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的主要发展目标,当前需要重点研究和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基本支撑力量是什么?应当说,年均6.8%的增长速度仍是一个相当快的速度。根据历史经验,重大工程及重大项目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我们能够适时提出未来五年需要开工建设、甚至是完成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的储备清单,以及相应的投融资安排和支撑,还有重大政策的储备和支撑。二是新的驱动力量是什么?面对当前国际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大趋势,如何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趁势而上?如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国创新驱动战略如何实现?基本路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是什么?三是“十三五”时期我们面临的最重要制约因素有哪些?产能过剩压力的持续积累、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不确定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创新驱动能力的培育和提高不理想、人力资源供应不足等,可能都是未来比较突出、需要重视的约束条件。

此外,为编好“十三五”规划,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值得特别关注和研究的重大问题还包括新的发展动力转换问题、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产能过剩化解问题、产业政策的效果检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城镇化问题、资源高效利用与环境保护问题、农业和粮食问题、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问题、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问题、对外战略的调整问题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划的关系,也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勿错过能源价改最好时机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协同创新中心 林伯强

长期以来,中国能源价格实行政府成本加成定价,公众习惯于缓慢上调的能源价格,加上公众对能源企业生产成本不了解,因此对能源价格改革十分敏感。事实上,受制于公众的承受能力和支付意愿,能源价格改革长期处于缓慢滞后的被动状态。如何通过能源价格改革有效分摊能源成本,既影响清洁能源程度,也影响清洁能源速度。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强调需要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将能源价格交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改革势在必行。

能源政府定价的问题很多,例如无法正确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市场的供需状况,以及能源的外部成本,导致能源信号失真,无法最优配置资源。此外,只要是政府定价,调价就常会被理解为政府涨价而不是市场供需导致涨价,因此涨价是政府不愿意做的事,就导致能源价格长期低于供应成本。能源行业供需中的矛盾,以及严峻的环境状况,追根究底都涉及能源价格。此外,雾霾治理措施中的控制能源需求,煤改气、煤改电将大幅度提高能源成本,为了减轻雾霾治理成本压力和进行有效的成本分摊,也需要进行能源价格改革,以缓解价格上涨的影响,并且通过价格设计解决公平负担和消费效率。现在政府采用“能源革命”的提法而不是“能源改革”,既说明问题的困难性,也说明紧迫性。

当前能源价格改革时机较好,不容错过。改革时机应该有两个特征:一是能源需求增长较慢,能源供需宽松;二是能源价格下行或稳定。能源价改虽有共识,但是顺利改革是有条件的,主要是能源价格上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公众的接受程度。因此,改革比较好的时机应该是在能源供需宽松、能源价格低迷而且可以预期今后一段时间能源价格仍将相对稳定。近年来全球能源供需状况和供应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十分有利于中国能源价格改革,特别是2014年以来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宽松,能源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大幅度下降。

从国际方面看,需求侧端,中国是全球最大能源进口国,对全球能源市场有重要影响。前十年中国能源需求增量占国际增量的比重一般在40%-60%之间,一旦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能源需求增长也将相应放缓,会比较大地影响全球能源需求增长。供给侧端,由于美国页岩油气快速发展改变了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卖方竞争加剧、买方需求不足、供给过剩是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度走低的根本原因,而且预期价格疲弱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市场对今后两年的石油价格依然悲观。国内方面,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将导致能源需求增长放缓,主要能源行业(煤炭和电力)产能过剩。改革是为了提高效率,需求增长很快的时候,满足需求增长是首要任务,效率是其次的,而一旦需求放缓成为常态,效率改革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

此外,当前能源价改也面临比较成熟的改革大环境。能源价格改革不到位或延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政府侧重于经济增长和满足普遍能源服务,而忽略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维持比较低的能源价格。正因为维持比较低的价格,政府需要考虑价格改革中公众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接受程度,这既涉及支付意愿,也涉及支付能力。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较低,因此能源补贴有合理性,但当前我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7000美元,如果参照发达国家经验,具备了环境治理的收入条件。而且,在环境和能源约束凸显的背景下,整体而言公众支持通过改革治理雾霾,决策层应该利用这一点,及时推出能源价格改革。

雾霾等环境污染已让公众切身感受到能源消费对环境产生的负外部性,一方面会愿意选择更加清洁的能源消费方式,另一方面也会比较愿意为环境治理分担成本。这样,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比较容易获取公众对能源价格上涨的理解和支持。国际经验也表明,民众对清洁发展的认可,可以倒逼政府和企业清洁发展,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环保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能源企业来说,甚至是受价格监管的能源垄断企业,改革是重大利好,关键是价格改革将提供价格的确定性,意味着更为稳定和可以预期的营运环境。改革显然有利于民营资本参与能源行业,促进能源行业混合所有制发展。长期以来,能源价格被政府作为政策工具使用,导致价格扭曲,以及价格形成机制的不合理、不透明、不确定,增加了民营资本进入能源领域的风险。去政府价格干预,相对确定的收益预期,是民营资本参与能源行业的基本条件。

从能源价改的基本内容看,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方向是有共识的,有争议的是改革的迫切性,即改革的程度和速度,以及对改革时机的认可和对改革后果的把握。能源价格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改变政府参加能源市场的方式,从直接定价参与改变为通过财税和补贴参与。通过能源价格改革和机制设计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平衡。基于这个原则,现阶段能源价格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合理、透明的能源价格机制,辅之以公平、有效的能源补贴设计和严格的成本监管。

房地产对经济的拖累将益发明显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夏丹

2014年末一线城市楼市量价齐升,其他多数大中城市成交明显筑底回暖,房价环比降幅进一步收窄,这是政策面宽松、流动性宽松环境下,房企以价换量与需求择时入市相结合的结果。而房地产投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非热销地区难以提振,预计2015年成交将继续小幅回暖,转正为个位数增长,房价环比上半年或可转正,全年同比可能稳中微升,投资增速上半年下探仍将持续,下半年有可能企稳。

房地产销售数据作为各项指标的先行军,2014年随市场调整出现大幅回落,四季度以来受政策放宽和资金偏松影响,呈现出明显的筑底回暖态势。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在2014年分别同比下降7.6%和6.3%,较2014年1-11月收窄0.6个和1.5个百分点。

结合房价来看,除一线城市出现量价齐升,其他多数大中城市以量升价稳的态势为主,房价同比依旧下行,环比降幅则进一步收窄。2014年1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环比均价跌幅为0.42%,较上月继续缩小;同比降幅继续扩大,但幅度开始出现变化,时隔4个月后再次出现同比上涨城市。这是政策面宽松、流动性宽松环境下,房企以价换量与需求择时入市相结合的结果,也是决策层较希望看到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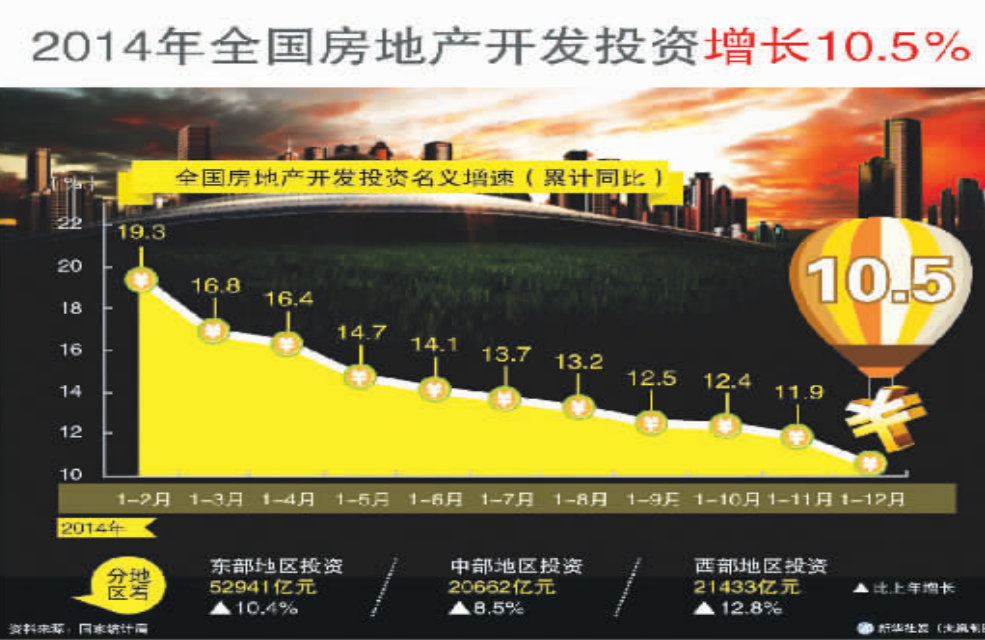
纵观2014年,楼市调整幅度之深超乎市场

想象。全年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比较上年末大幅下滑25和32.6个百分点;2014年12月房价已经回落到2013年5月水平。展望2015年,楼市成交量将继续小幅回暖,转正为个位数增长,春节过后,有望迎来刚需入市的一个小高峰。房价环比回升已成定局,上半年有可能转正;同比则依旧探底,全年可能稳中微升。

从资金面来看,2015年资金环境趋松,利好供求双方。在需求端,按揭贷款和公积金贷款政策的持续调整使申请门槛降低、使用比例增大,促进需求入市。2014年12月,按揭贷款优惠利率进一步降低,9折以下利率重现市场,尽管需附加一定的要求,但对提高需求购房能力有实质利好。

在供给端,除了销售回款加快,再融资放开也对房企资金面构成利好。近日证监会全面放松上市房企再融资政策,今后不再需要经国土部进行事前审查。核准制的放开将简化房地产再融资流程,加快资金运作速度,有利于改善房企资金状况。

资金环境的改善使行业整体风险下行,但“黑天鹅事件”也引发市场担忧。佳兆业事件从房源被锁到面临重组,负面影响持续扩大,市场不会不出现连锁反应?笔者认为,这仅是个案,不排除还有其他类似情况发生的可能,但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极低,房源被锁不应被过度解读。



房地产投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201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95036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5%,增速比2014年1-11月份回落1.4个百分点,比2013年回落9.3个百分点。尽管房企拿地热情相对提升,但笔者仅结构性看多一线和少数二线城市,非热销地区的投资提振不易。房地

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间的剪刀差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房地产对经济的拖累作用也将越来越明显。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探在2015年上半年仍将持续,随着销售情况持续改善和流动性逐渐宽松,利好因素积累到下半年可能带动投资企稳。

外贸增速有望与GDP增长基本同步

□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副研究员 肖新艳

2014年12月,我国外贸月度进出口额首次突破4000亿美元,超过预期。年末的翘尾表现使全年外贸增速定格在3.4%,这个数字与年初设定的7.5%的目标有差距。从发展阶段交替的宏观视角出发,2015年中国对外贸易将有望实现与GDP基本同步的增长速度。

2014年对外贸易增速低于年初目标的原因有三。一是2014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外需状况改善不明显,导致拉动出口的力量不持续、不均衡。2014年初,普遍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将在2013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IMF在年初的时候预计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3.7%左右。但实际情况是全球经济复苏不均衡,增长弱于预期。2014年10月,IMF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了0.4个百分点。外需对出口的影响可以从机电产品和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变化上得到部分体现。除了年初受春节因素影响的季节性波动外,2014年9月之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月度出口增速高于机电产品,然而2014年四季度以来,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速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在12月有较大幅度反弹。这一变化与这两类商品主要需求来源地经济状况的波动相一致。2014年二季度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相应地对机电产品的需求逐步回升。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市场集中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后者在今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减速,需求减弱。

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以及国内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过程中投资需求放缓对进口拉动不足,两个因素相互叠加抑制了进口增长。2014年我国进口铁矿砂、大豆、原油和成品油的单价比去年分别下降22.5%、5.9%、5.0%和3.4%。

三是众所周知的贸易套利因素。按照正常

增速倒推估算,2013年虚假贸易金额约500亿美元左右,占当年出口总额的2.3%,影响2014年进出口增速1.2个百分点。

整体来看,2014年出口开局较弱,年中逐步企稳回升,在三季度实现13%的快速增长,四季度有所放缓,但全年仍实现了6.1%的增长,实属不易。2014年前三季度进口维持正增长,四季度在大宗商品大幅下滑的拖累下负增长1.6%。

2015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不容乐观。近日,世界银行将对2015年全球GDP增速的预测下调0.4个百分点至3.0%。虽然美国经济发展势头较乐观,但欧元区经济复苏脆弱,日本经济前景不乐观,以及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加之不确定因素存在,2015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外部需求环境并不乐观。

从国内环境看,目前我国经济呈现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

动转变等“新常态”,与之相匹配,外贸在增长速度、增长动力和结构等方面也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速度来看,2012年、2013年和2014年我国进出口增速分别为6.2%、7.6%和3.4%。这种连续三年的个位数增长确实是改革开放首次出现。这与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外贸的超高速增长相比确实是新变化。从外贸增长动力看,我国外贸竞争优势和国际分工地位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依赖要素投入实现的高增长难以为继,外贸发展同时受到资源能源供给、市场发育、环境支撑和大国国际责任等因素约束。

2015年是新一轮改革继续深化的一年,也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从发展阶段交替的宏观视角出发综合判断,2015年中国对外贸易将有望实现与GDP基本同步的增长速度,外贸转型升级步伐将继续加快,结构继续优化,综合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增强。